

二十世纪外国现代战争诗精选

我和死亡有一个约会

I Would Apart With Death



博尔赫斯
埃利蒂斯

T.S.艾略特
叶甫图申科

等著

梁梁 厉云 选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外国现代战争诗精选

我和死亡有一个约会

I Would Apart With Death

博尔赫斯
埃利蒂斯

T·S·艾略特
叶甫图申科

等著

梁梁 厉云 选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和死亡有一个约会/梁梁、厉云选编.-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7-5033-1789-2

I. 我… II. ①梁…②厉… III. 诗歌-作品集-世界 IV.I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6894 号

书 名: 我和死亡有一个约会

责任编辑: 博尔赫斯 T.S.艾略特 等著
埃利蒂斯 叶甫图申科

责任编辑: 刘立云

封面设计: 涅娃风格设计室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603 千字

印 张: 20.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789-2/I·1386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火焰的剑为我们劈开大地(序)

厉云梁梁

无论作为军事文学作者，还是作为军事文学编者，我们对这样一部二十世纪外国现代战争诗精选都向往已久。开始的时候，我们总觉得编辑这样一部书，需要有深厚的外国文学功力和长期的外语训练，惟有外国文学专家和学者才能担此重任，只好耐下心来等待。等待它出现在新华书店的新书架上，等待它突然投递到我们的案头上。但许多年又许多年过去了，这种漫长的等待却始终没有结果。这种集体的疏忽，是因为这个选题涉及的面比较窄，还是那些专家和学者们一时顾不上来？后来我们寻思，造成这部书缺失的责任，也许应该由我们自己来承担。因为我们两个人对中外军事文学都还算熟悉，对二十世纪外国现代战争诗也情有独钟，又同在军队出版社工作，而且我们工作



的出版社还是全国惟一的军事文学出版社，如果我们自己不主动去做这个选题，还能盼望谁去做呢？

应该感谢 2003 年那个令人揪心的夏天，或者干脆说，应该感谢这个夏天突如其来的那场瘟疫。那场瘟疫的到来，虽然让我们也像许多朋友那样坚壁清野，深居简出，却又意外地把我们从紧张的编辑工作中解脱了出来。作为一种抵抗方式，我们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开始了一次疯狂的阅读。但我们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只读几年来甚至十几年来存放在书架上的那些读过的和没来得及读的外国现代诗歌。在阅读中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曾经深深触动过我们、启迪过我们和震撼过我们的现代战争诗悉心地挑选出来，然后汇在一起。

这就有了这部二十世纪外国现代战争诗精选——《我和死亡有一个约会》。

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汇集在这部书里的二十世纪外国现代战争诗，几乎全部出自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出自被这两次世界大战长久笼罩的阴影中。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按照传统的说法，当西方社会发展到大工业时代，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都在发生从来没有过的剧变。这时候牧歌式的乡村生活正在逐渐消失，大量人口拥进快速膨胀的都市；各工业中心拔地而起的水泥建筑，一面把人们的躯体紧密地包围起来，一面又把他们的心灵分割得支离破碎。随着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这四种关系（也可说是四种矛盾）的日益普遍化和尖锐化，人们的内心世界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挤压下，开始变得紧张、焦虑、空虚和悲观失望，如同城市上空的鸟无处可栖。社会生活和人们内心世界的这些变化，反映到诗歌创作上，如果继续沿用传统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已显得左右受制，力不从心，这样文学表现方式的主观性和内向性便成了一种必然，现代主义的诗歌创作从此走进了它的萌芽时期。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场战争与以往战争的最大不同，首先，它是在工业革命的心脏欧洲爆发的，那接踵而来的战乱和危机，让内心本来就处在紧

张、焦虑、空虚和悲观失望之中的人们，又平添了更为严重的恐惧和哀伤；其次，这场战争波及地域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对人类生存世界破坏之严重，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世界在一夜之间变得满目疮痍，战争践踏过的地方，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到处都是血腥，到处都是废墟，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人们。令人悲哀的是，屠杀是在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展开的，军人们为着统治集团的利益前赴后继地走向战场，置身于炮火和弹雨之中；无辜的平民则朝不保夕，像野草一样被炮火和刺刀一片片刈倒。许许多多的人瘞骨荒野，许许多多的人亲眼看到了战争曾如何毁灭他们的城市，撕裂人们的生命，践踏人类的尊严。许多经历过战争和正在经历战争的人，在无比痛苦和绝望中，对战争产生了极端的厌倦和憎恨。他们为失去理智的人类感到羞耻，为世界的未来感到彻心彻骨的忧虑。当诗人们把这些在战争中亲身体会到的恐惧、悲伤和震颤，把他们对人类命运的痛苦思索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一种崭新的与现代战争相对应的文学样式便宣告诞生了。这就是现代战争诗。最能说明现代战争诗产生过程的，莫过于英国现代派诗人狄兰·托马斯的那首《拒绝哀悼死于伦敦大火中的孩子》了。这首诗以一个女孩在伦敦空袭中不幸丧生为起因，但诗人坚韧地节制住悲哀，一反常态地表达了一个在战争中生不如死的主题。诗人认为，在战争降临的时候，人们被无辜地抛入血腥的战场，与其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倒不如像这个孩子那样早早地死去，回到神的怀抱。因此他说这个在空袭中死去的孩子其实是有福的，我们活着的人没有必要如此悲伤地哀悼她：“伦敦的女儿葬在深埋先辈的地方，/众多的亲友替她裹身着衣，/年久的谷物，母亲忧郁的心绪。/为奔腾不息的泰晤士河冷漠的/河水无情地吞没。/第一次死亡之后，再也没有死亡。”从此可以看出，与传统的浪漫主义诗歌相比，现代战争诗首先是用现代人的视角与心理去认识和评判战争，它在揭示战争残酷的同时，对人类共同的遭遇和命运，表达出一种在传统诗歌中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大悲悯，大哀伤；其次，它对于战争抱有自己的政治态度，但这种政治态度常常是消极的，无望的，然而它表达这种态度的方式却与前人有了很大的不同。其最大的不同，便是



不再像浪漫主义那样直抒胸臆，多半采取讥诮、隐喻、象征和反讽等手法，对我们生存的社会和人类的命运进行悲愤难消的反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战争诗对于揭示战争的本质和人的本性，有着不可替代的尖锐性、复杂性和深刻性。在诗的构架和内涵方面，也因其思想的坚硬、繁复和含混，而显得曲意回转。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作为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外国现代战争诗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形成的西方社会思潮和西方现代哲学，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水乳交融的血亲关系。我们应该承认，现代战争诗从西方现代社会思潮，特别是从现代哲学身上吸取的元素，不仅有它们的思想成果，而且还有它们新颖独到的思维方式。不指出这一点，我们就几乎无法找到解读现代战争诗的钥匙。正因为有了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和现代哲学，现代战争诗歌才有了深厚的理论根须，这使它从战争的土壤里一生长出来，就显得根深叶茂，锋芒毕露，既能刺入人们的心灵，又能指向战争的内核。我们知道，当十九世纪的黄昏来临的时候，资本主义已全面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即表现为资本的高度垄断和集中，它使本来就扭结在一起的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我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更加脆弱，更加不可调和。一切都必须以帝国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权利和人格的尊严被普遍异化。种种矛盾的激烈冲突，最终通过垄断资本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破坏、对传统价值观的动摇和人们对经济的恐慌、对战争的极端恐怖得以反映。战争说打就打起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只有束手就擒，任其奴役和杀戮，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信仰出现了真空，科学真理被普遍受到怀疑，一种人类毁灭在即的情绪就像瘟疫那样向四处弥漫。就在这人们的心灵普遍需要得到安慰的时候，尼采和叔本华的意志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哲学思想的兴起，一时成为人们对抗社会 and 重新认识世界的精神武器。这些社会思潮和哲学观念渗透到诗歌创作之中，由于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的新颖，使诗人们的表达顿时有了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现代战争诗就这样展开了它从社会和哲学中获得的两翼，开始在硝烟密布的天空高高飞翔。

在众多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想中，尤以意志主义和直觉主义对现代战争诗创作的影响最为深刻，也最广泛和持久。尼采与叔本华一脉相承的意志主义哲学，是一种强调个体生存的哲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深怀恐惧。他们认为现代文明的衰退是由于理性过于发达造成的，从根本上损害了以人的本能和意志为依靠的创造力，因而他们把宇宙、社会、文明和人类当做盲目的力量予以否定。在叔本华和尼采看来，人类越趋于理性，科学技术将越发达；而科学技术越发达，反过来对人的本能和意志，对人类和自然界已经形成的秩序，将造成更大的扼杀力和摧毁力。例如人类总是把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用于战争，而战争的手段越是先进，对人类的屠杀便越是残酷，对自然界的破坏也越彻底，越触目惊心。用这些哲学思想去观察、体验和剖析战争，诗人们一方面把创作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战争的独特感受上，着力开掘人在战争中的无意识和本能的状态；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到对战争的思考上，把一切战争都归结为人类的自我残杀，自我毁灭。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国人把原子弹投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顷刻间把这两座城市夷为平地，让成千上万的人在痛苦中死去——对此，诗人们无不感到目瞪口呆。他们接受不了人类自身制造的这一巨大暴力，深陷在和这一事件同样巨大的迷茫之中：难道我们追求的科学和文明，就是为了征服自己？就是为了用来更多更快更残酷地杀人？当他们从这巨大的震惊中清醒过来，通过诗歌对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除了回响内心经久不息的颤栗之外，便是对战争进行痛心疾首的声讨。“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哺育着/丁香，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记忆和欲望，拨动着/沉闷的根芽，在一阵阵春雨里。/……我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人。/叹息，又短又稀，吐出了口，/每一个人的目光都钉在自己足前。”（T·S·艾略特《荒原》）在诗人的眼睛里，战争已经把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场；那些在战争的威胁下得以继续活着的人，也如同行尸走肉。

如果说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哲学对现代战争诗创作的影响主要是偏向于宏观的话，那么柏格森直觉主义哲学的影响则主要偏向微观，作用于现代战争诗创作的神经末梢。柏格森的所谓直觉，是指凡



是人都具有自觉性的本能，人们惟有凭借直觉才能认识真理或真实，才能创造和欣赏美。因而必须信赖和忠实于自己在一瞬间的印象和幻觉。为此，柏格森创立了非常有趣的“空间时间”与“心理时间”两个概念，他认为对时间既可以用现实固定的方式来说明，也可以用心理感觉的方式来透析。所谓“空间时间”，是把时间看成是流水似的依秩延伸，说明时间具有一定的宽度；所谓“心理时间”，是指时间可以相互渗透，然后通过我们的心理折射出来，说明时间具有无限的强度。“空间时间”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可以丢下不说，最有意义的是“心理时间”：那是一种可以定格、可以回放、可以遮蔽、可以膨胀的时间，具有无限的弹性。我们越是进入意识的深处，心理时间的强度便越大。柏格森关于“直觉”和时间的这些思维新概念，给现代主义的文学表达带来的启示，几乎可以说是一场革命。运用这些思维方式，你可以在感觉的一瞬间纵横捭阖，放纵奔流；可以打破时序的疆界、生死的疆界，把遥远的事物和遥远的人与眼前的事物和眼前的人巧妙地连结在一起；你可以叠加，可以互借，可以跳跃，可以通感；还可以把灵魂一劈两半，然后互相审视，任意揉搓，如此等等。就像一页白纸，一团黑暗，那上面原本什么也没有，你可以让它什么都有。一个作家和诗人的想像力于是变得举足轻重，就像大地上的生命须臾离不开空气和水。当时欧洲出现的意识流小说，就是因为运用了这些思维新概念，从而在时间的处理和结构的安排上对以往的小说进行了一次颠覆。现代战争诗的创作，其实比意识流小说的创作还更早更普遍地接受了这场革命，走得甚至比意识流小说还更远。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这部书里几乎可以信手拈来：“我的脚踩上了那打着我的/长矛的阴影。我死亡的嘲弄，/骑兵，鬃毛，一匹匹战马，/收紧了我的包围圈……这是最初的一击，/现在坚硬的铁把我的胸膛刺破，/亲切的刀子穿透了我的咽喉。”这是一首名为《猜测的诗》的最后一节，出自阿根廷著名诗人博尔赫斯之手，完成于1943年，全诗以一个阵亡者的口吻述说他被游击队刺死的过程。在这首诗里，生与死的界限被彻底打破了，死亡的时间随逐渐展开的细节被一再放大。最突出的是感觉的迷离：你看“长矛的阴影”竟然能“打着我”；“骑兵，

鬃毛，一匹匹战马”却是对“我死亡的嘲弄”，而且是“最初的一击”。最绝的是“穿透了我的咽喉”这把刀子，他说是“亲切的”！

从这里，你是否看到了现代战争诗的绚丽和奇异？

当然，在我们说到现代战争诗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异军突起的时候，并不能否认现代战争诗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父与子的关系。但前者让后者更快地走向了成熟，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因为没有什么比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更为深重了，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引发的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更耐人寻味了。现代战争诗正好得天独厚地获得了这个机遇，让自己迅速长出了华丽的羽毛。换句话说，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上，现代战争诗不仅用诗意及时地记录了这两场人类经历的最大灾难，再现了人们对战争的深刻思考，而且捷足先登地完成了诗歌形式的自身革命，于是在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早早获得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形象地说，现代战争诗像沉钟，像暮鼓，像凝固的鲜血和呐喊，也像一把“亲切的刀子”。

捧着这部二十世纪外国现代战争诗精选，相信每一个喜欢它的人，都会感到它的厚重，它的庄严。因为汇集在书里的世界各国诗人，有许多不仅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在世界上都是有重大影响的。在这些诗人中，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就多达 22 人。有的诗人如里尔克、博尔赫斯，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其诗歌的成就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丝毫不亚于获得这个奖项的其他人。还有，在本书中收集的作品，有不少同时是诗人们最有影响和最有力度的作品，例如艾略特主要就是凭着《四个四重奏》、埃利蒂斯主要就是凭着《英雄挽歌》、萨克斯就是凭着揭露法西斯集中营罪恶的那些作品，而赢得世界声誉的。有些大诗人，如奥登、塞弗尔特、叶甫图申科和阿米亥等等，如果抽去他们的现代战争诗，那他们一生对诗歌的贡献就将大打折扣。还有的诗人，如留下不朽之作《我和死亡有一个约会》的阿兰·西格，本身就是个冲锋陷阵的战士，最终又以自己的牺牲印证了自己诗中的预言，从而为现代战争诗增添了血的光芒。



至于亲身参加过战争而有幸存活下来的诗人，在书里更是比比皆是。

话说到这里，我们需要指出，虽然战争的爆发往往是不分国界的，但又毕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对抗。既然战争与地缘如此紧密相连，那么创作这些战争诗的各国诗人就不可能不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或者说，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战争中的遭遇没有太大不同，各国各地域的诗人对战争的感觉和思考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但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战争地位、不同的战争结局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同样会在诗人的创作中打下各自不同的烙印。在这部诗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战争诗与以俄罗斯及前苏联为中心的现代战争诗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有思维方式上的不同，更有意识形态上的迥异。一般来说，欧美现代战争诗比较偏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诗人们大多用心用力地去发掘人在战争中的独特经验，并从来都不回避对政治的质疑和拷问。诗歌的基调尽管是多声部的，但从总体上看普遍显得冷峻而沉郁，苍凉而伤感，带有明显的反战反英雄倾向；前苏联和东欧现代战争诗则鲜明地突出国家的意志和民族的形象，高扬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旗帜，基本上没有另外的声音（布罗茨基曾发出不同的声音，被斥为‘寄生虫’而驱逐出境）。诗歌的基调热烈而沉雄，悲愤而刚烈。他们也写流血牺牲，也写生灵涂炭，但却写得热血喷涌，激情飞扬，从主观上试图给人以希望，给人以鼓舞。若干年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东西方之间在战争诗创作上的差异，我们有勇气指出，就诗歌的品相而言，似乎欧美诗人在战争与人这个关键层面上挖掘得比较深入，也更接近诗歌的本质；前苏联和东欧诗人崇尚正义崇尚英雄的品格，值得我们钦佩和效仿，但却失之思维单调和主题单一，至今读他们这些作品，总有那么一点浅尝辄止的味道。即使从俄罗斯白银时代过来的那批在世界上有相当名望的诗人，如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等等，也不能免俗。自然，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人所共知的，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事实也毕竟是不可更改的。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战争诗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深受前苏联和东欧诗风的影响，乃至今今天还有人难以脱离其束缚。从尊重诗歌创作规律来说，我们似乎没有

必要因为意识形态上的认同而忽视其质地的粗实和陈旧。

同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有些特例却如同奇迹,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刺激。一是处在东欧和西欧之间的波兰、捷克和希腊,这三个欧洲小国在二十世纪先后向世界贡献了米沃什、希姆博尔斯卡、塞弗尔特、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等五位大诗人,成了让人羡慕的诗歌大国。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五位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的作品中,战争诗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联系这些大诗人所在国家的历史文化渊源,再联系这三个国家(尤其是波兰)在二十世纪发生的战争中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这种特殊地理位置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的特殊战争遭遇,我们可以看到,特殊的地缘政治,同时也为这些国家的诗人带来了观察和体验战争的特殊视角。这种特殊视角,既能让他们站在受难者的位置看待战争,又能让他们以旁观者的姿态去描述战争,而且还能兼容东西方国家透视战争的文化优势。如此以来,他们的战争诗创作便有了自己独特的心理层次和品格。二是在战争前后流亡异国或异地的诗人,他们中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俄罗斯流亡到法国的蒲宁,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德国流亡到瑞典的萨克斯,有在战后许多年分别从前苏联和波兰流亡到美国的米沃什和布罗茨基等等。这些诗人带着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带着故土人民或自己在战争中的感同身受,在政治和艺术氛围相对宽松的国度亲身参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这使他们在进入诗歌创作的时候,既能努力吸取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又能自觉地消除民族偏见。这时留在他们心目中的那片国土,已经成了他们精神的参照,或艺术标本;而从自己的现实境遇出发去思考人类的命运,才是他们热衷于追求的目标。因此,即使面对自己亲爱的祖国,他们也能站在维护人类尊严的立场上,不偏不倚,发出不违背诗歌良心的声音。有了这种境界,他们创作的诗歌,就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现代的;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米沃什那首言简意赅、绵密深远的八行短诗《逃离》,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清晰的轨迹:“当我们逃离了燃烧的城市/从最初的田间小路回头望去,/我说:‘让草掩盖住我们的脚印,/让刺耳的先知们在火中沉默,/让死者向死者解释发生了什么。/我们注定



产生新的激烈的部族/没有邪恶和浑浑噩噩的快乐/我们走吧’——火焰的剑为我们劈开大地。”在这里，诗人要“逃离”的，实际上是那片饱受战争创伤，让他既爱又恨的土地；“火焰的剑”其实就是真理的剑；而这柄剑“劈开的大地”，则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从战争的沼泽里升起的那片崭新的大陆。

阿米亥也是这样一个面对真理如同裸婴般的诗人，他用一生的创作说明地缘政治完全是可以超越的，也完全应该超越。一个诗人真正的家园和故乡，其实就是他（她）那颗引导着人类和平共处的诗的心脏。这个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生在德国，并在那里度过完整童年的犹太籍诗人，对日后发生的德国法西斯残酷迫害犹太人的罪行，无疑是深恶痛绝的，但当他在1936年移居巴勒斯坦之后，当他在二战中以志愿者的名义亲身参加英军犹太支队对德作战和在1948年亲自参加以色列独立战争之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消失了，一个博大的人类主义者诞生了。从他在阿以冲突的战火中写作的大量诗歌中，你将看到，作为诗人的阿米亥，他不再为某个民族的野蛮而义愤填膺，也不再为某个民族的倍受屈辱而痛心疾首——他认为任何战争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任何在和平中生活的人们都必须获得最起码的尊重，因此他毕生都在为消除战争泣血而歌；因此他全部的努力，就是用手术刀般的诗句把战争的身躯一刀一刀地解剖给人们看。诗歌的力量就这样爆发了，据说以色列士兵上前线时必须带两样东西：一是行李，一是阿米亥的诗集。

正是这样，诗人对战争发出的声音，就应该是唤醒人类良知的声音，就应该是大地的声音，天空的声音，生灵和草木的声音。请听阿米亥在《和平幻景的附录》中的呼唤：

把刀剑打成犁铧之后
不要停手，别停！继续锤打，
从犁铧之中锻造出乐器。

无论谁想重新制造战争



都必须先把乐器变成犁铧。

感谢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和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年代为我们翻译这些珍贵的现代战争诗作品。我们编辑出版这部书，只想把散落在各种书本里的这些珍品聚拢起来，为对现代战争诗感兴趣的朋友，特别是对在现代战争诗的创作上有所期待的朋友，提供一份参照。至于说到编选质量，恐怕会因为我们的视野、见地、学识和品位有限而难如人意。例如同欧美相比，亚洲、非洲各国的作品选得就少了些，使得选本显得不够完备。好在我们有足够的诚意和耐心，对于书里肯定存在的种种遗憾，恳请看到它们的有识之士能及时予以教正，到时我们将努力改进。

2004年11月8日 于北京平安里

目录

WO HE SI WANG YOU YI GE YUE HUI



火焰的剑为我们劈开大地(序) 厉云 梁梁 1

阿根廷

博尔赫斯(1899—1986)

墓志铭 蔡天新/译 1

伊西多罗·阿塞维多 陈东飙/译 2

猜测的诗 陈东飙/译 4

纪念胡宁的胜利者苏亚雷斯
上校的一页 陈东飙/译 6

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上校
(1833—1874)之死的典故 陈东飙/译 7

断片 陈东飙/译 8

李的一名士兵 陈东飙/译 9

致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上
校(1833—1874) 陈东飙/译 10

奥地利

策兰(1920—1970)

死亡赋格曲 钱春绮/译 12

数数扁桃 钱春绮/译 14

傅立特(1921—1988)

暴力 马文韬/译 15



澳大利亚

斯莱塞(1901—1971)

滩 葬

刘新民/译 18

坎贝尔(1915—1979)

绿衣士兵

刘新民/译 20

华莱士—克雷布(1934—)

他 们

刘新民/译 23

阿尔及利亚

哈姆萨特(1933—)

孩子的梦

汪剑钊/译 25

保加利亚

瓦普察洛夫(1909—1942)

歌

冯 春/译 26

有这样一个字眼

冯 春/译 28

玻利维亚

弗雷伊雷(1868—1933)

英 雄

赵振江/译 30

加拿大

马克雷(1872—1918)

在佛兰德的田野上

洪 怡/译 31

阿特伍德(1939—)

最初,我有几个世纪

李文俊/译 33

白蒂(1943—)

笔与剑

王宏印/译 35

波兰

霍朗(1905—1980)

战后的母亲们

杨乐云/译 38

塞弗尔特(1901—1986)

你,战争!

叶尔湔/译 39

军人墓地上

星 灿 劳 白/译 40

悲伤曲

星 灿 劳 白/译 43

没有翅膀

星 灿 劳 白/译 44

第十一个春天

星 灿 劳 白/译 46

关于女人的歌

星 灿 劳 白/译 47

智利

聂鲁达(1904—1973)

国际纵队来到马德里

赵振江/译 49

一个兵士在睡觉

王央乐/译 51

战 争

王央乐/译 53

祖国的战争

王央乐/译 55

哈拉玛河之战

邹 绛/译 57

保加利亚

法朗萨(1925—)

和 平

汪剑钊/译 59

丹麦

诺德布兰德(1945—)

内 战

北 岛/译 60